

Shanghai, 1927-1937

Municipal Power, Locality, and Modernization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上海史研究译丛

[法] 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著 张培德 辛文锋 肖庆璋/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27-1937年的上海

——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



Shanghai, 1927-1937

Municipal Power, Locality, and Modernization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上海史研究译丛

[法] 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著 张培德 辛文锋 肖庆璋/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27-1937年的上海

——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法)
安克强著;张培德,辛文锋,肖庆璋译. —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4.8
(上海史研究译丛)

ISBN 7-5325-3815-X

I. 1... II. ①安...②张...③辛...④肖...

III. 城市-政权-研究-上海市-1927~1937

IV. D69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5804 号

1927—1937 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

Christian Henriot

Shanghai 1927—1937: Élite locales et modernisation dans la Chine nationaliste

© 1991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nglish translation © 1993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本书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译出

上海史研究译丛

1927—1937 年的上海

——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

[法]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著

张培德 辛文锋 肖庆璋 译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2 $\frac{12}{18}$ 插页 5 字数 233,0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100

ISBN 7-5325-3815-X

K·608 定价:2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 56628900×813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学科项目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张仲礼 陈 绛 魏斐德(美)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军	马学强	卢汉超(美)	叶文心(美)
叶凯蒂(德)	毕可思(英)	安克强(法)	张晓敏*
周 武	周育民	高纲博文(日)	梁元生(香港)
熊月之*	黎志刚(澳)		

有*者为执行编委

执行编辑: 张晓敏 吕 健

本书责任编辑: 李志茗

美术编辑: 黄 琛

技术编辑: 富 强

上海这座城市，既饱经沧桑，给人以复杂的历史感，又生机勃勃，给人以常新的时代感。用得着一句老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上海史研究，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海外学者更是情有独钟。即使不算一百五十年前麦都思对上海历史的简单描述，也不算稍后麦克莱伦的《上海史话》、裘昔司的《历史上的上海》，单从 1921 年、1923 年寓沪英国学者兰宁、库寿龄共同推出的功力深厚的两大卷《上海史》算起，海外学者对上海史的研究已有 80 个年头了。尤其最近二十多年，海外上海史研究更明显呈现“四多”，即项目多、会议多、成果多、人才多。在美国，西部伯克利、洛杉矶、俄勒冈，东部康乃尔、哈佛，北部密西根，都各有学者在研究上海史。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我国的香港、台湾，也都有学者在从事上海史研究。日本有上海史研究会之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因研究上海史人多势众，在美国学术界曾有“上海帮”之谑称。

上海史已是海外汉学界公认的热门话题，堪称显学。

海外学者究竟发表过多少关于上海史的著作，难以确计。据不完全统计，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德、法、英、日等国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三百篇，正式出版的上海史著作不下五十部。

上海史是内蕴极丰的富矿，开采眼光、冶炼技巧因人而异，其产品自然也多姿多彩。有的对社会史、文化史感兴趣，有的对政治史、经济史感兴趣；有的纵贯古今，有的横跨多门；有的以资料翔实著称，有的以议论充当见长。他们共同构成上海史园地的繁盛景观。

上海史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翻译海外上海史研究成果是上海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城市史、近代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学科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上海史研究译丛》遂应时推出。

本丛书所选各书,是我们接触到的优秀著作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书颇具价值,但或因已有中文译本,或因翻译版权联系未妥,未能列入。遗珠之憾,尚望鉴谅!

本丛书编委会成员除了上海的学者,还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的学者,他们都是上海史研究专家。在《译丛》组织出版的过程中,他们帮助推荐作品、联系版权、校订译文,付出了很多劳动。

本丛书具体翻译工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

张仲礼、陈绛、魏斐德(美)三位著名学者多年从事上海史研究,欣然担任《译丛》顾问,帮助规划全局、解决疑难问题,使丛书增色不少。编委会特此表示感谢。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致 谢

本书起初是在巴黎第三大学白吉尔(M. C. Bergère)教授指导下的博士论文“1927—1937 年上海市政府”。研究工作总是一种个人行为,同时又离不开集体。我要感谢所有对这本书提供帮助的人,特别是白吉尔教授,她悉心指导我的论著,并鼓励我将其出版。

我还要感谢莱曼·范斯雷克(Lyman P. Van Slyke)和哈罗德·卡恩(Harold Kahn)对我在斯坦福大学及朱丽亚·童(Julia Tung)对我在胡佛东亚图书馆期间所给予我的建议和大力支持,他们以无穷的善意泰然回应我无数的求助。

本书没有皮埃尔-伊汀纳·威尔(Pierre-Etienne Will)的仔细和耐心审阅是不可能完成的,他指导我改写了最初的稿子。还有伊维斯·西瓦里(Yves Chevrier),他审阅了最后的文稿,并除去其中的杂质。我真诚地感谢他们,至于本书的缺点,那完全是我的责任,而与他们无关。

本书的完成还得益于法国青年研究者基金的资助,它使我能于1982年访问中国;还要特别感谢ITT国际协会的奖学金,由于它,才使我能花一年(1981—1982)时间在斯坦福大学和胡佛研究所查阅和收集资料。

导 言

19 世纪末,当上海开始显示其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贸易港口以及主要的金融和工业中心的地位时,它发现自己处于实施众多政治目标的十字路口。在一次次被追求、被攻击、被诋毁中,上海既成为各种争权夺利者的竞争场所,又成为他们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7 年出现的国民党政权标志着上海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建都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是脆弱的。新政权控制的只是一小部分地区。国民党传统的根据地广东在其控制范围之外。其他新征服的省份依然为原来的统治者所控制,他们几乎都不愿意去服从首都的命令(特别是财政方面的命令)。上海于是成为致力于在这个城市建立控制权的新政权的支柱,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核心中枢。

于是这个大商业都市的编年史上开始了独一无二的实验。一个现代化的行政机构欲把这个城市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不是全部城市的命运,其结果由具体实验性质而定,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包括的两个区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行政权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这两个区域在任何意义上说都共同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中心。这种情形——事实上这个城市的管理被分成三部分,而中心部分在它的控制之外——还仅仅是中国市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中国市政府尽管真诚地渴望表现它自己作为上海的最高当局,但只是一种幻想,事实表明它不会有跨越这个障碍的任何行动。

以上海作为特例了解在国民党政权下的一个中国市政府的运作体制,是 본 研究的课题。尽管近几年出现了大量论述中国晚清城市社会史的著作

和有关民国时期(1912—1949),特别是1927年(其时国民党政权重建了表面上的统一体,并将其作为与现代化的任务相联系,尽管有不确定的意图和不相等的结果)以后城市机构与社会和政治变化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的论著,然而历史研究的这个领域到写作此书时几乎还是空白。^①

相当丰富的原始资料(在更广泛的范围来看,这样的资料是相当不够的)以及自从19世纪中国开放以来由于外国人的到来而引起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得到的收获造就了上海作为评价这个政权和城市精英的现代化趋势不可替代的优越地位。本书对该城市历史的研究着眼于社会和政治的交汇,因而是对目前已有的关于上海社会发展的生动描述,就如对该城市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生活所作描述的适时补充。^②

根据这个观点,本研究提出三个问题。首先是关于市政机构的性质。这将通过描述该机构的起源,分析它的运作模式及其采取的手段和确立的目标来进行探讨。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现实的市政权力:那些为此而角逐的人们,他们的动机和策略,以及他们围绕市政府的工作而竞争的结果。这个问题将通过有系统地描述掌权人物及他们的行为模式,以及通过研究他们争夺权力的方式来加以考察。第三是企图确定中国市政府的具体行动计划以及在这个城市实施的改革。

给市政府命运带来沉重压力和种种抑制的因素需要被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责任和过去的遗产的范围中去观察。尽管有其新特点,在上海进行的实验无处不在;这不是纯粹政治决定的结果,而是本世纪初在中国尤其在上海开始的地方机构发展的漫长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是曲折起伏的、断断续续的;更确切地说这个过程是前进和后退、稳定和中断兼而有之。而且,要在上海建立市政机构的种种意图都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即国家的官僚逐渐地呈现出抑制地方的积极性,而地方机构,除了极少时期,从来没有能够摆脱官僚监护的束缚。

这种机构经常朝着更少“大众的”和“民主的”(这些词汇的确切含义将在第一章加以定义)方向发展,这在那些界定每一阶段法律行为的机构的法律文件上可反映出来。在国民党人的政权之下,这个进程加速了,官僚的束缚更紧了。建立地方机构的方针毫无疑问是以突出国家的作用为基础的。人们发现表达的途径由于法律的复杂性而不断地减少,且最终被堵塞。在上海,政府的意图是运用这些法律建立一种障碍,难以打破的障碍,从而阻止人们对总的法律概念,甚而对确实存在

的市政府产生疑问。

然而这个政府最高权力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市政府行动的绝对自由。新一代的政治斗士；国民党中年轻而有野心的少壮派渴望领导角色；同时，地方名流，这些迄今为止在该地舞台上的主要演员还没有消失在舞台两侧。两个竞争集团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质难市政府并试图扭转它的政策。市政当局首先成了国民党地方党部机构的一次抗议运动的目标。怀疑市政府领导——他们正统的政治观念并不总是毫无问题的——和以党的特权和权力的积极保护者姿态出现，国民党的斗士们不断用批评和要求骚扰市政府，试图使市政府成为他们所希望的工具。

结果，他们介入了同另一集团的冲突。该集团希望建立一种稳定的地方当局，而他们将是一种稳定的地方当局的受益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更确切地说是作为资产阶级的集团变得空前削弱，直至该集团变成仅仅是上层知名人士、金融家和企业家的小圈子，他们同这个政权的联结是建立在其中许多人同当时的中心人物蒋介石(1887—1975)的私人关系上的。他们与市政府领导的关系及他们的经济力量使得这个集团的成员——尽管不断受到党的代表的抨击——能够对市政方针提出意见和发挥影响，有时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营造了这样的印象，即没有他们，在上海什么或总是什么也做不成。

从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东三省之后的事件可看出商人集团同国民党斗士之间的对抗明朗化了。市政府试图保持中立，避免表示其对商人集团的同情。结果，它发现自己不情愿地被拉进了一场没有人能真正控制得住的运动之中。1931—1932年冬天，一场猛烈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发展导致了主张强硬路线的学生们和总体上更温和稳健的商人们之间的冲突，国民党地方党部既试图保持对前者的紧密控制，同时又想利用这个运动以削弱后者。在此过程中，国民党地方党部采取激烈的方式，酿成了骚乱，而其本身则最终成了骚乱的牺牲品。

抗议的浪潮也波及到了市政府，它几乎被这遍及全市的混乱局面所毁。然而，政府由于此次经历而变强并更自信于它的权威，这权威由于1932年1月日本对上海的进攻引起的同仇敌忾而得到加强。它必须面对的严重考验，给其提供了机会来证明它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对处于困境中的群体采取行动和提供帮助的能力。在这混乱当中，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权力一度崩溃，而同时，控制这个城市经济生活的地方名流小团体引人注目地恢复了他

们在市政机构内的地位。

上述概述提供了一个市政府赖以形成、并且在此基础上设想和实施其城市发展政策的政治和历史背景。若不事先对可以从中获得的资料进行研究,即事先对这新的地方管理机构的内部结构进行考察,就不可能理解市政府的城市发展政策。传统制度方面的探讨似乎还不足以达到这个目标。把研究集中在市政府职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官员方面证明是更富有成效的。这种“人物传记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理解该正式结构作用与看上去更琐细的运作,及市政府官员内部存在着的非正式关系。缺乏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这一极为重要的事实的认识,所作的分析将触及不到最本质的东西。这一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研究市政管理机构的内部运作,而且有助于说明市政府领导层与中央政府、地方精英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之间的关系。

对市政府财政资源与政策的考察构成了本研究的精华部分。仅仅一连串的数字尚不足以说明市政府面临的所有问题。在考察它的财政政策之前,必须先考察这新的行政机构的性质、它巩固其地位和获得社会认可的能力、它的信用和正统性。由此引出对市政府和当地居民之间关系的研究,当地居民包括精英与小纳税人群体,他们针对某种特定社会条件的抗议活动常常妨碍市政府领导的现代化计划。所有这些因素为评价市政府十年时间在他們限定的范围内城市管理的成就,或者说是有限的成就,提供了依据。

城市功能和城市居民生活方面的进步当然不是微不足道的。市政府五花八门的活动性质排除了对各个方面任何详细考察的可能性,以至某些活动其象征意义超过实际意义。无论如何,最具重要意义的活动已如本研究前面部分提出的问题那样被引证、说明和分析。用这样的精确性来描绘它们也许不是十分必要的。但被视为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其是被贮藏在那些更实在的、已被实施的计划之中还是存在于那些依然停留在制图板上的宏大构想中。就像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即使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它也不应被忽视。^④在这十年过程中,许多劳力、智力和资源已经投入,我试图公正地再现这些成果。

将要看到的整个印象是一份相当明确的资产负债表,甚至有些迹象表明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被浪费,以及 1937 年达到的均衡仍然是脆弱的。中日战争给进入成熟期的实验(虽然它的稳定发展在任何情况下因为没有合适的制度和经济的稳定而缺乏保障)画上了句号。

-
- ① Elvin 的开创性工作之后有许多值得提及的研究：Sanford 1976；Skinner ed. 1977；Rowe 1984 和 1989；Johnson 1986；MacPherson 1987；Bernstein 1988；Goodman 1990；Kwan 1991；Wakeman 1992。民国时期已有若干著作论及：Coble 1980；Coleman 1984；Fewsmith 1985；Hershatter 1986；Honig 1986；Strand 1989。
- ② 特别参见下列著作：Chesneaux 1962；Honig 1986；Bergère 1986；Roux 1992；Henriot 1992。
- ③ Greisert 1979。

目 录

致谢.....	1
导言.....	1
第一章 历史的重负.....	1
缓慢的酝酿.....	2
地方自主的扩大.....	3
新的市政机构.....	5
1911：短命的胜利.....	6
漫长的等待.....	7
国民革命的希望.....	8
新政权的创建.....	10
第二章 法律要旨.....	14
市政法规：先例.....	14
1927 年的法规.....	15
管辖权的争论.....	16
1928 年和 1930 年的法规.....	19
市政府机构.....	19
市参议会.....	20
第三章 市政权和地方精英.....	24
国民党地方党部.....	24

国民党的少壮派在上海	25
初次尝试	27
1929 年的代表大会及其影响	28
1930：坚持党的主张	30
1932—1937：出现瘫痪	32
地方名流的小圈子	33
1927 年的市参议会	34
名流悄然官复原位	35
商团的改革	36
1932：恢复	37
市参议会的责任	39
第四章 1931—1932 年的危机	46
抵制日货运动	46
日本的反应	48
国民党的作用	49
民族危机与地方冲突	50
12 月 8 日事件	51
上海的政治和社会动荡	52
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瓦解	53
市政府的重组	55
走向同日本的对抗	56
日本的侵略	58
紧急救济的组织	59
战区的恢复	61
重建	63
重建计划	65
民众中的抗议运动	66
第五章 市政府职员	75
主要的市政府官员	75
市政府职员	85
第六章 市政府财政	97
市政府的财政机构	97

市政府附属的财政机构	99
市政府的收入来源	100
市政府的财政困难	103
市政贷款	110
财税改革与商人的不满	113
第七章 城市规划	124
市内的住房和交通	124
上海公用事业	127
大上海计划	128
市政规划	129
第八章 现代化的试验区	137
教育政策	137
当局和管辖权的争论	137
市立学校	138
私立学校	141
租界的教育	143
民众教育	144
开展识字运动	146
公共卫生政策	147
学校卫生	147
社会卫生	149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发展	150
第九章 传统与现代化	157
社会事务局工作范围	157
运作方式	158
大米战	158
对贫穷的挑战	161
与慈善机构的联系	161
难民问题	162
控制贫民窟的斗争	163
人民信贷中心	165
结论 国家、党派、精英与中国社会	171

第一章

历史的重负

在中国，市政机构的发展较迟。据我们所知，中国没有与欧洲相类似的经历，从12世纪起，欧洲城市就通过特赦从国王和贵族那里获得了自由。解释这种不同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官僚政治维持其对社会的控制无所不在，以及与潜在的竞争者保持相当距离——尤其是商人，他们的财富和集中在城市使他们成为潜在的力量，但他们在孔子的价值体系中得不到尊重。

这个观点必须加以修改，因为事实要复杂得多。实际上，政府与商人之间有着事实上的联系，尽管商人总是遭受政治上的排斥，被拒之于权力之外。他们似乎从未发展成一个可能挑战根深蒂固地信守国家官僚政治至上的同一团体。^①与此相反，官僚地位显赫，甚至商人们认为值得追求的唯一经历是成为达官贵人。商人们利用中央政权衰弱或已经崩溃的时期来增加他们的自治程度，但他们从未能把经济力量变成政治权力。^②

近年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城市的社会结构能够提供很大部分的解释。这些研究成果指出城市人口参差不齐的特征与其来源于不同地域有关：城市人口主要由不断流动的旅居者组成。为应付他们离乡背井的状况，他们会合在会馆和同乡会。这些会馆和同乡会仅仅增大了众多群体各自的特征，防止构成同一和坚固的城市阶层对官吏更有利，这些官吏能利用这种分裂的社会结构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除此而外在宏观经济学层面上存在的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一个是结合官僚政治的不同基层组织的行政管理系统，一个是反映经济生活运作和连接贸易中心的“自然”系统——引导他们各自向着某一系统开展活动，阻碍了官僚和商人走到一起。直到近代

以前,这些状况并没有特别有助于地方绅士组成机构参与管理他们的城市。只是到了 19 世纪中叶那些传统的团体(例如会馆和同乡会)开始在某些城市会合,并且不仅对其成员提供服务(经济、消防、治安),而且开始将这些服务扩展到全体居民。按罗威廉(William Rowe)的说法,汉口情况就是如此。在汉口,一个独立的城市阶级正在出现,这导致某种土生土长的城市精英或者说资产阶级的形成。这种现象是否在其他城市也是如此,或只是在汉口是这样,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顾德曼(Brynn Goodman)关于 19 世纪中叶和民国初年期间上海的研究倾向于指出地方特性压倒城市世界主义,虽然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市政机构是由上海绅士在 19 世纪末建立的。^③

缓慢的酝酿

伊懋可(Mark Elvin)已经对市政机构的形成和逐渐发展的特例作了生动的描述,他不认为这种机构起源于清政府。这种现象涉及各种因素。无可争辩,19 世纪清政府的权力逐渐衰弱。潜在的经济危机开始显现,同时代表清政府的那些权力正在各种地方暴动的作用下趋于崩溃。^④太平天国起义造成清王朝混乱的同时,在其影响所及的地方造成了一种不安全感的增长。

在这变幻莫测的强烈运动中,地方绅士自己组织起来以挽救清政府权威的衰落和保护地方秩序的延续,这个阶段被认为具有新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地方精英自动地承担起了迄今为止一直由政府垄断的责任。即使清王朝设法打垮起义并重新控制全国,它也不能取消这不情愿的权力委派。^⑤

在上海本身某些传统的团体经历了变化,这使得他们更经常地介入政治生活,在这些团体中,慈善性的组织起了主要的作用;它们早期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与救助穷人和孤儿有关。现在他们逐渐将他们的活动领域延伸到这样一些任务,诸如筑路、维持小股的治安力量和建立消防队,政府当局企图把他们的干预维持在最小程度,因为这些活动已经习惯性地遗留给了地方精英去做。在这些慈善组织中,地方绅士,尤其是商人已经获得了优势地位。

其次,会馆这个此前只对其同业成员开放的社团开始有系统地组织和把他们的互助服务延伸到更广大的社会方面。最后,一种新的机构“局”在清代(1644—1911)末年建立起来,局通常负责特殊的任务(如征收某些税